

金沙文史資料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金沙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405

前 言

《金沙文史资料选》第一辑，现在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它的编辑出版，不仅是金沙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们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五周年国庆的一份礼物。

金沙，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只是小小的一个“点”，她同样也有着灾难深重的过去，奋发向上的今天和光辉灿烂的未来。

多少年来，金沙各族人民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顽强战斗，为她的自由解放，为她的繁荣富强，谱写下一首首壮丽的诗篇。尤其是解放以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金沙已经跨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奋进不息！

但是，在今天，在高歌猛进的今天，我们怎能忘记那些为金沙人民的自由解放，为保卫金沙人民的胜利果实而英勇战斗的前辈，流血牺牲的先烈，他们是金沙人民的优秀儿女，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的名字将流芳百世，他们的业绩将彪炳千秋。

本辑是半个世纪来金沙革命斗争的记录，是金沙由黑暗进入光明的历史缩影。在编选过程中，不仅有许多革命前辈为我们积极撰稿，也得到了各方人士，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我们编选时间仓促，兼以水平不高，在史实和文字方面，难免有许多不足乃至错讹的地方，恳切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此外，《金沙文史资料选》，今后将陆续编辑出版，欢迎关心金沙建设事业，熟悉金沙情况的同志给予支持并不吝赐稿。

政协金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政协金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
李旭华烈士传	陈璞如 季呈如 季凤舞 单衍华 (1)
第一次解放金沙前后一些主要情况的回忆	
.....	袁良骥口述 王汝辉整理 (25)
金沙剿匪战斗回忆	李仿尧 (彝族) 口述 (42)
难忘的战斗岁月	周化民 (58)
回顾金沙两次解放	张守琮口述 何正寿整理 (66)
忆金沙保卫战	张振学 (83)
三十年代新场革命史	蓝芸夫 (89)
记蓝运威烈士	宋子宽 (149)
李绍夫烈士传略	何正寿 (167)
林正良烈士传略	周自楷 (180)
林正良烈士遗作	(195)
忆四姐蓝运铮烈士	蓝运清 (200)
闲话五十七年前	周承绪 (207)
今日打鼓新场	阳伯铮 (216)
发展中的金沙	何宗甲 (221)
征稿启事	政协金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40)

运臧开始读书，是在私塾，读的书不外《三字经》、《女儿经》、《四书》之类的古书，受的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教育。

一九二三年春天，黔西宿学张仲芳来新场设馆。他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封建文人，具有民主爱国思想。他教学虽然也用《四书》、《诗经》、《古文观止》之类的古书作教材，但在讲解中却有新的意义。运臧和她大哥运富（现名芸夫）、四妹运铮烈士、以及林正良（共产党员，烈士）等人，都出其门下，后来有的成为共产党员，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仲芳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和当时的报纸上选择了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文章来教授学生。例如北洋军阀时期一位进步记者的狱中诗：“国破家亡莫说哀，王郎仗剑几徘徊。”

“建业何时能建业，长安未必可长安，莫到昆仑山上望，东来毒雾日漫漫。”还教过五卅惨案时，报纸上揭露帝国主义凶残横暴地屠杀中国人民的文章。这些，都使运臧激动得流下热泪。张仲芳讲过清初具有民主思想的作家黄宗羲的《原君》，运臧读到“有圣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时，反复熟读深思，受到感动，十分赞赏，后来她确实成了一个“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为革命献身的志士。

二

运臧学习勤奋，她精读过几百篇古代散文和几百首诗，能写文言散文，会作诗、填词，也能绘画，画的荷花、

兰草，秀逸中有劲健之气；在音乐方面，吹萧、弄笛、弹风琴，都是妙手。她不仅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小说，能背诵《红楼梦》中的许多诗词，而且阅读过《西厢记》之类的古典戏曲，从这些作品中吸取了反封建的思想。她也爱好文言小说，能背诵《聊斋志异》的序言，题辞，以及“异史氏”的评语等。她喜欢评论这些作品，往往有独特的见解。由于运臧和她大哥运富都勤奋读书，富有文彩，新场一带许多人都称道“蓝氏兄妹”，特别是穷乡僻壤中的这样一个女学生，大家格外钦羡。

那时，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一般女孩子，十来岁就有人来提婚的。运臧也被父母许配给一个“门当户对”但又不识不知的男孩。运臧知道后，坚决反对。她接受了兼课英文老师周承绪（后来在美国留学，入美籍，当教授，八一年曾回国在南开大学讲学）的主张，到贵阳读书，促使家庭废除了某家的婚约。反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在新场还是创举。

三

二十年代末期，新场这样一个偏僻的小镇，青年女子要到离家几百里的省城去读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一九二七年春初，运臧却排除了一切阻力，冲出家庭，和周光懿、冉淑贞去到贵阳，考进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那封建礼教严密禁锢的社会里，大家闺秀，是不许抛头露面的，运臧竟能冲破禁区，出外求学，实在要有很大的决心与勇气。

缠脚是封建社会残害妇女的一种手段，运臧也是被缠过

脚的。一到贵阳她就首先把脚解放了。至于头上，那时新场一带的姑娘们都拖着一根长辫子，运臧也不例外。运臧初到贵阳时，是把辫子挽成一个螺形的小髻，垂在耳后，不久，她就一剪刀把它截短了。别看这是一件小事，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个惊人举动。黔西有一位绅士，女儿要剪发、放脚，出外读书，他竟急得要跳河自杀。由此可见运臧的行为是多么的勇敢！她又写信给新场几个妹妹、外甥女，叫她们把脚放了，把发剪了。一时新场一带的姑娘争相仿效，蔚然成风，就是顽固的父母要禁止女儿放脚、剪发，也无能为力了。不久，黔西新场一带的姑娘们不笑大脚笑小脚，不笑短发笑长发，运臧是开风气之先的。

运臧聪明勤奋，孜孜不倦地学习，学业成绩一向优秀，得到许多教师的好评。那时学校有这样一个常规：教师评改到学生优秀的卷子，往往把它张贴出来，供大家观摩，叫做“贴堂”。运臧的卷子有时得到贴堂。现在保留有她五年级第二学期的成绩单，在十三门功课中，甲等十门，乙等只有三门。新场一带的女青年到贵阳读书的逐渐多起来了。她们中间有的人英语、数学基础较差，运臧就利用休息时间为她们补习，使她们赶上班上水平。她们有疑难问题，又都喜欢找运臧商量。因此，运臧成了黔西新场一带来贵阳读书的女同学的中心人物，大家都亲近她，尊敬她，亲切地称她三姐。

一九三〇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运臧休学一年，在黔西新场女子小学教书。那时风气闭塞，很多人家都不愿叫年龄稍大一点的姑娘来学校读书。运臧花了不少力气去发动女生来校就读。她跟家长们谈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意义，劝他们

送自己的女儿去读书。跟女同学们谈：女子要求解放，首先要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如果不受教育，没有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便不能摆脱家庭和社会的压迫。在运臧的宣传鼓动下，很多姑娘都冲出家庭来学校读书了。她的妹妹运铮、运清，外甥女陈德昭、陈德淑（现名余英），以及亲友中的另外一些姑娘都到贵阳去读书。后来有些人参加了共产党，运臧就是她们的启蒙老师。据她教过的学生回忆：运臧对学生和蔼可亲，教学极端耐心，要求又很严格。对有错误的学生，总是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决不急躁。学生都非常尊敬她，爱戴她，乐于接受她的教育。

四

一九三一年，运臧又回到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去读书。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要摆脱其深刻的经济危机，实现其并吞我国的狂妄野心，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出兵占领了我东北三省。蒋介石国民党不顾国土的沦丧与民族的危亡，采取了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革命的反动政策，拱手把东北三省奉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而集中一切军事力量对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发动猖狂的“围剿”。全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无不义愤填膺，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策尤为深恶痛绝，全国各地爱国学生更是怒火中烧、热血沸腾。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要求抵抗日本侵略。他们奔赴农村，走向街头，宣传救亡图存，杀敌保国。贵阳几所中学的学生，以秦天真、丁树奇等人为首，组织了“贵州学生救国团”，运臧参加了

该团。在学生救国团的领导下出版了《救国旬刊》，组织了宣传队，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一九三一年冬，运臧又与尹素坚、何治贤等筹组“贵州妇女救国会”，运臧当选为该会的理事。她们办起了又一个救亡刊物《惊蛰》，运臧担任编辑，每周在《新黔日报》上出刊一次。运臧在该刊上写文章，用的笔名是“问耕”。

女师的同学也常常组织街头宣传。运臧身材不高，相貌文静，但在讲演时却声音高亢，言语生动，当她讲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买国投降的罪恶时，激昂慷慨，往往声泪俱下，听众受到感动，悲愤交集，有的人甚至为之流泪。

在寒暑假中，运臧和她大哥运富回到黔西新场，常常组织青年搞救亡宣传活动。那时新场一般人把演话剧叫做“唱文明戏”。运臧不但自己参加演出，而且发动其他女青年参加表演。他们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反对日本侵略，唤醒群众觉悟，积极起来抗日救国；也宣传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改革鄙恶风俗等。这些宣传，对于灌输爱国民主思想和反封建势力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演剧在当时来说，一般人都认为不是姑娘们干的，思想封建的人说：“蓝家这样的书香人户，姑娘们竟不顾体面去唱戏，简直不象话。”但是看过演出的人却说：“她们表演得好，宣传的内容都是些正大光明的道理。”

一九三二年，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数量特别增多，贵阳有好些大商店也充满了日货，所以抵制日货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贵州学生救国团和贵州妇女救国会等救亡团体提出了“抵制仇货，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决定

发起一次运动，制止商人继续贩卖日本商品。秦天真等学生运动健将，把高中、一中、女师、达德……等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浩浩荡荡开往贵阳市中心游行、宣传，对大量贩卖日货的个别商店进行了搜查，捣毁了仇货最多的商店恒兴镒。这次运动，运臧是女师学生中的骨干之一。在她们的宣传下，有些商业家庭的同学，就主动地劝告父母，不再贩卖日货。由于学生的爱国行动直接损害到一些资本家的利益，同时也对军阀的统治不利，所以他们对学生救亡组织异常仇视。一九三三年“九一八”二周年纪念，贵阳各校学生举行爱国游行，军阀王家烈就派出军队来镇压，用汽车来冲闯学生队伍。爱国游行学生，面对军警，毫无惧色。运臧在这次游行中表现得很坚强，当女师游行队伍被军警阻拦时，她冲到队伍前列，对军警们说：“你们也是中国人，亡了国你们也要当亡国奴。救国是每一个同胞的责任，你们有良心，不能阻挡我们的爱国游行。”有些军警受到感动，羞惭地站着。警戒松弛了，学生队伍便乘机冲开了防线，继续游行。这一事件的消息传到上海，鲁迅先生于十一月十七日写了《冲》（见《准风月谈》）这篇文章，热烈地声援了贵州学生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抨击了贵州军阀的反动行为。

五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落后的贵州传来马列主义却晚在三十年代初期。运臧是贵州最早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之一。一九三二年，运臧为要找寻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开始

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流行于贵阳的马列书籍，大多数是直译本，不唯书中的许多名词难以读懂，就是文字也夹有外文语法，晦涩艰深，较难理解。运臧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地阅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暂时保留，在继续阅读中再求理解。她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马列著作的。例如，一个星期天，新场留省学生到红边门外一个尼庵里去吃饭，别的同学都到庵外游玩，她却坐下来起劲地读书。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马列主义的书是禁书，学生读马列的书，轻则要开除学籍，重则要“犯罪”坐牢。可是运臧不怕这些，她不但自己阅读，而且组织了一些青年同学来阅读。一九三三年初，运臧和寇述彭、丁道谦、沈永贤、涂运昌、方伯龄、蓝运富等男同学，以及马彦云等女同学，大约十来人，以结拜兄弟姊妹为掩护，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他们经常在涂运昌家开会，交流读书心得，讨论国内外形势，在理论上和思想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逐步侵入，继东北沦亡之后，华北又陷入日本的虎口。面临国家民族的存亡关头，蒋介石仍坚持其所谓“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一面对日本步步退让，拱手把大片国土丢给日本帝国主义；一面调集大量军队继续对苏维埃区进行军事“围剿”。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大、中、小学学生纷纷起来游行、请愿、示威，全国一片沸腾。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要压制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之上。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发布了一个《中学生毕业考试规程》，要举行会考。当这个《规程》发到贵州时，贵阳市各中学的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贵州省教育厅根据

《规程》“毕业考试在会考前两星期举行”的规定，宣布要贵阳市初高中应届毕业生举行会考。读书会成员在涂运昌家开会，一致认为这个会考制度是国民党政府为要束缚学生思想，压制民主爱国运动而制定的，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复活，要坚决给它“一颗炸弹”。于是推举人员，分别负责，一面草拟、印制揭露会考阴谋和反对会考的“快邮代电”，请求各界人士支持；一面分头与各高初中应届毕业同学联络，发动他们反对会考。“快邮代电”在论述国际形势一段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上已出现了‘五等于四’的新奇算术”，这是指社会主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就全面完成，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国民党腐败统治相对比，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腐朽。这个“快邮代电”是在一中学生自治会办公室用红色纸张印刷，以象征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

会考的考场设在女师。那天早上八点钟，各校应届毕业同学齐集女师大礼堂前广场上，一个主持会考的官员来到考场，命令学生集合，只有少数考生拢去，站成一个歪歪扭扭的队伍。那位考官刚开始训话，队列外有一个同学发了一声“向后转”口令，考生们立即转了个一百八十度，背向那位考官。大家一阵哄笑，于是寇述彭开始演说了。他揭露了会考制度的反动性，号召同学坚决反对，并提议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会考制度。大家一致赞成，游行队伍出发了。他们先到教育厅，厅长谭星阁不敢出面，只叫了个秘书出来跟学生“解释”。队伍又到省政府，省长王家烈也不敢和学生见面，只叫了个属员来接见。学生们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会考宣布垮台了。

由于蓝运臧、寇述彭是这次反对会考的领导人，于是被教育厅指为“肇事者”而挂牌开除学籍。蓝、寇二人嗤之以鼻，继续奔驰于革命的道路。

六

一九三四年，运臧回到新场家中，在兄弟姐妹间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他们走无产阶级的道路。她叫小弟妹们要做“普罗”，不要做“布尔乔”。还教育弟妹们将来要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给堂妹起名“运思”，给堂弟起名“运维”。

为了与封建势力斗争，运臧费尽千辛万苦，在黔西筹得一点经费，创办了一个小型的石印刊物《黔西月刊》。这个刊物的内容是：报道时事，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封建势力，提倡妇女解放，以及改革鄙俗，戒除鸦片等。刊物发行的数量不多，但在黔西却引起很多人的重视。例如抨击贪官污吏的无法无天，揭露土豪劣绅的横强霸道，都震动很大。她指责“堂堂黔西中学，校长室内，一张烟榻，八圈麻将，特吹大赌，居然恬不为怪。”有一首《戒烟歌》，不但文字生动，脍炙人口，而且收到实效，有的人读了《戒烟歌》以后就戒了烟。正因为刊物的内容触怒了官吏绅士们，所以不久就被迫停刊了。

在办《黔西月刊》的同时，运臧积极找党，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正逢贵州地下党领导干部邓止戈于一九三四年春由贵阳去毕节开辟工作，贵州地下党工作人员李余生告诉止戈同志：蓝运臧是一个革命女青年，在黔西办了一个进步刊

物。并托他带了《新哲学大纲》、《社会主义十二讲》和《政治经济学》译本等书给运臧。邓到毕节后，运臧和他通信，并请他为《黔西月刊》撰稿。邓写了纪念革命烈士的长诗《何秀芸之死》，寄给运臧。在以后的通讯中，邓谈到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运臧赞成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又谈到一些革命理论问题。运臧估计邓是地下工作人员，所以向邓提出入党要求。邓答应协助她找到党的关系，意思是愿意介绍她入党。以后，因为中央红军开始进入贵州边境，邓忙于迎接红军的工作，要离开毕节。所以邓函告运臧，以后可到贵阳尹素坚同志处找他。运臧到尹处，没有找到止戈同志。

但是，就在这一年——一九三四年蓝运臧的愿望实现了，她由秦天真同志介绍，参加了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成为贵州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七

一九三四年，潘汉年同志参加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潘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委员秦天真同志派运臧与潘汉年同志假扮夫妻，掩护护送。从贵阳取道广州，赴上海。潘去海参崴；运臧去北平。运臧到北平的时间为一九三五年六月①。

出发前，运臧曾回新场家中，对此行目的严格保密。在一个晚上，运臧和她的哥哥运富齐声背诵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饥馑匪自天，荼毒究由人。富者余粱肉，强者

斗私兵。依欲均贫富，依欲抑强权，愿为司瘟使，除彼害群遍。……去吧，二弟呀，我愿你鲜红的热血，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三弟呀，去吧！”兄妹二人，壮怀激烈，相对歔歔，这位女共产党员，用悲壮的告别，教育她的哥哥。

运臧到北平以后，考进了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贵阳与运臧一同建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发动反对会考和被开除学籍的寇述彭正在北平上朝阳大学，他们会面了，又一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同参加“一二·九”运动。在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北平结了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也揭开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序幕。芦沟桥事变后，运臧和述彭一道赴山西临汾上民族革命大学。民大虽是阎锡山办的，具体领导人却是共产党的干部薄一波、杜心源、严希纯等人。教授中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侯外庐、何思敬、李公朴、徐懋庸、李平心等。学校内部的革命气氛是很浓厚的。

在民大时，运臧和述彭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一月，民大学生揪出托派头子张慕陶（化名马云贵）和他的老婆。大家知道托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破坏抗战的汉奸，群情激愤，把这个坏蛋打得头破血流。民大学生成立了公审托匪张慕陶的委员会，运臧和述彭都是委员。他们奔走呼号，联络革命同志，开大会，作讲演、出墙报，搞得热火朝天。运臧、述彭和另一位同志，还到临汾附近的刘村与八路军学兵队联络，请八路军支持这一场反托派的斗争。后来由于临汾沦陷，民大疏散到晋西，这场反托派斗争才不了了之。

临汾沦陷后，运臧和述彭曾去六十六师的部队作抗日救亡工作，但不久就离开六十六师奔赴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去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运臧和述彭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三期本来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的，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全国各地革命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开学以后，随时都有新学员涌入，随到随即编队；同时也有许多学员，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学期未满随即调出学校，奔赴革命工作岗位。运臧和述彭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抗大的。运臧和述彭经过在抗大学习，更增强了战斗意志，丰富了斗争经验。

八

一九三八年七月，运臧和述彭离开延安去山东聊城专区。聊城专区的专员范筑先是一位抗日民主人士，能与共产党合作。运臧和述彭在聊城地区，深入群众做抗日救亡工作，运臧的抗日中型剧《五里雾》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在聊城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一年冬天，他们搞了个国民党的证明文件，以平津流亡学生的身份，辗转回到贵州黔西打鼓新场。回到家乡后，他们积极在亲友中宣传党的抗日民主政策，讲述抗日形势，并把从延安带回来的革命歌曲教给青年们。例如《游击队之歌》就是运臧带到新场来的。运臧还亲自导演她编写的抗战剧《五里雾》，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受到观众的赞赏和欢迎。

“七七事变”前，龙云长期统治着云南。“七七事变”后，中国广大地区相继沦陷，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

云南。龙云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接纳了这些人士。云南财政厅长、富滇银行行长、开（远）蒙（自）垦殖局长缪云台，于“七七事变”后，在蒙自县草坝筹办了蚕业新村。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访问延安后，经四川、贵州到了云南，由黄炎培介绍，受聘去开办蚕业新村，在蒙自县草坝设村务处，由缪云台任董事长，黄老主持常务。

黄老邀集革命青年二十余人来到新村，一面进行村务工作，一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运臧夫妇应黄老之召，带着四妹运铮来到蒙自草坝蚕业新村。蒙自草坝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有汉、回、彝、蒲拉等民族，地方闭塞，文化落后，封建势力也很顽固。要在这里开创工作，的确是颇不容易的。在黄老的精心擘划下，村务工作分为总务、文教、卫生、妇女、康乐和学术委员会等。村务处建立不久，即从湖南招来一批青年，授以蚕桑技术知识。黄老派寇述彭和王之浩去培养这批青年，运臧姊妹和别的几个同志则被分配去搞文教工作。她们先后办起了农忙托儿所四所，还有小学、夜校等，分布在草坝一带的村庄。村务处编印教材，宣传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大捷，介绍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将领的生平事迹。还出墙报、画报，举行摄影展览等。遇到节假日，便举办文娱活动，演出话剧，合唱陕北民歌，跳秧歌舞等，进行宣传活动。运臧等日夜工作，深入基层，很得群众爱戴。群众称运臧为“大蓝先生”，称运铮为“小蓝先生”。村务处还给群众排忧解难，夫妻吵架，找运臧和述彭，婆媳纠纷，找运臧和运铮，群众对她们十分信任。

蚕业新村的工作开展不久，政治形势便日趋恶化了。国